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2年9月16日第B4版)

京城风雨

主席8.18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句“要武嘛”进一步激励了全国“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红色恐怖从学校迅速蔓延到全社会。首都的大街小巷里都有穿着绿军装的中学红卫兵，挥舞着皮带抄家、打人、破四旧。我家后窗临街，可以清楚地听到胡同里一阵阵的骚乱。“红八月”里整个北京城一片腥风血雨，非正常死亡人数据说超过1770人。

运动大潮一波高过一波，不断有党政高层领导被打倒。我感觉有一只手在一层一层地剥洋葱头，不知道下一层剥出的阶级敌人是谁。但是我相信一切都在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中，惊愕只是出于自己的无知。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全民一起怒吼：“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上层的权利斗争我不了解，对揭发出来的很多罪行我并不相信，知道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但是出于对文革初期工作组推行的学生斗学生的反感，对刘邓也少有同情。

随着揭发批判“走资派”和“反党集团”的深入开展，我看到了政治斗争的冷酷。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我努力洗刷自己的头脑，试图“跟上历史的车轮”。我经常和同学到各个大学看大字报，和大学生们交谈，了解运动发展的动态和不同的观点。我们在目不暇接的风云变幻和各个派别的混战中不停地思索，不断地站队。

在红色恐怖中对文革理论有任何怀疑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我对“过枉必须矫正”的暴力合理性和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越来越抵触。那些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居委会大妈们戴着红袖章风风火火地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检查设好的神坛，要求大家每天对着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同院的张奶奶心灵手巧，做了一个漂亮的请示台，主席像四周围绕着八朵葵花，意为朵朵葵花向太阳。由于她是国民党军官的遗孀，街道大妈们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她们问张奶奶，中国有七亿人口，为什么她剪了八朵葵花，是否居心不良。老太太被罚跪斗争了大半天。

我们在家墙上贴了“请示台”以应付检查，但是关起家门没有人请示汇报，因为毕竟太荒唐太傻了。我们小时候陪外祖母去过缸瓦市基督教堂，那里的敬神礼拜也没有如此愚昧癫狂。

假大空笼罩着全社会。学校午餐前，即便饥肠辘辘，必须先背诵主席语录，超过外祖母的餐前祷告。在宗教式个人崇拜的高峰，课间操被改成忠字舞。其中用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动作是戏剧里的孙悟空抬脚勾手瞭望，然后挥棒抡打，很难做得整齐，变成了群魔乱舞。很多同学不以为然，但也不敢发出反对之声，阶级斗争的惨烈程度让大家噤若寒蝉。

压抑久了总要发泄。一天晚上学生宿舍里只有我和同学任群，我们心血来潮，对一个墨水瓶展开了“大批判”。我们“认定”它是不老实的反动分子和两

面派，效仿批斗会上的紧张气氛和穷追猛打的恶毒语言，把它批了个透。墨水瓶即便有口也难以辩解。我们心照不宣地嘲笑了运动中极左荒谬的思维方式和专制暴虐的语言，两个人笑出了眼泪，可是谁也不说出对运动不满的话，言外之意只能心领神会。我们都带着面具在世间行走，面具下是难忍的内心压抑。

“革命”浪潮席卷了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触及了每一个人。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人性中愚昧恶毒卑鄙的一面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理性善良正义的一面被压制。今天被世人嘲讽的中国大妈大爷们大多是我的同代人，灵魂里残留着文革的印迹。

在“伟大胜利”的光辉下整个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大串联中我们看到江西弋阳武斗后的死尸，成都十四岁花季少女在马路旁的坟莹，重庆被大炮炸毁的医院，嘉陵江大桥铁栏杆上嵌入的装甲弹壳和沉没在江里的登陆艇，南京夜幕下疯狂奔驰的卡车上在皮鞭下惨叫的人，和无数被破坏的历史文物。有些人高喊着领袖万岁在武斗中杀了人，又同样高喊着领袖万岁在严打中被枪毙法办。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和平时期的内斗让族群分裂，让经济几近崩溃。

1967年下半年，全国大串联被中止了，领袖号召结束武斗，各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我们从心底迫切希望文革结束，继续学业，走向正轨，于是一家家去动员同学不计前嫌，回校复课。但是我们知道，文革前天真烂漫，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不复存在了。学校无政府主义弥漫，实行了军管。到女附中军管的是某部炮兵团。结束军管后他们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上山下乡-“革命小将”们的归宿

复课后并没有上文化课，只是把这帮“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社会上游荡惯了的年轻人收回到教室，学习政治文件，继续大批判。大学不办了，教育制度砸烂了，升学考试取消了。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激励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小时候曾经对将来有一天会离开父母的呵护步入社会感到胆怯。如今经历了政治动乱、大串联的走南闯北和家庭的被冲击，目睹了无数官民的受难离世，对世态炎凉，生命贵贱有了不同的感觉，比过去更能够直面人生。

我校的分配工作是从初中和高中的66届毕业生开始的。极少数同学被招工到青海和陕西的三线工厂。之后是北大荒建设兵团招人，我和大多数同学都报了名。

我的兵团申请没有被批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不适合去位于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是中国唯一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母亲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还被关在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牛棚”里监督劳动。学校没批准我的申请，我没有去争取。我学会了荣辱不惊，保持

自尊，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兵团招工之后就是大规模的下乡插队，北京第一批有组织的插队是到内蒙古锡林格勒盟牧区。建设兵团至少是连队编制，有固定工资。而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会有更多的挑战和未知。我对上山下乡没有任何激情和冲动，但还是报名了，直到被批准后才告知父母。在社会的大趋势下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凭着自信随波逐流。

任群是参加初中66届毕业分配小组的学生。她知道我要去内蒙牧区后很着急地找到我，怕我受不了内蒙高原的荒蛮严寒。她要去和学校说一下，让我和她一起去北大荒。她后悔当时主动提议不批准我去黑龙江，认为我有关节炎，又生冻疮，不能适应东北的寒冷。她没有想到我会去更冷更艰苦的蒙古高原。

我每年冬天都会生冻疮，手指肿得像胡萝卜，关节处的裂口几乎深见骨头。妈妈每次看到我手上的伤口都感到扎心的痛，给我买冻疮膏抹手，用辣椒杆、茄子皮煮水浸泡，都收效甚微。当时的教育要求学生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课间操一律不准戴手套。我的手在北京冬季的寒风中冻得红紫，伤口崩开渗出鲜血，像有无数竹签扎入，痛入骨髓。有一次我忍不住钻心的疼痛哭了起来，同学们围着我无比同情又爱莫能助。

我感谢了朋友的好意，决定去内蒙。一方面自尊心不允许我去和学校交涉任何有关个人得失的事，另一方面对陌生的草原充满好奇。我决心接受命运的挑战，相信在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我一定能够活下去。我热爱我的故乡和家人，但是厌倦了疯狂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中的尔虞吾诈。我响应号召，远赴内蒙牧区的“革命”举动或许可以减轻父母在工作单位所承受的政治压力。

去北大荒的列车从北京出发时，我到火车站送别任群，依依惜别，互望珍重。从此天各一方。

送走了去东北兵团的同学，我开始做插队的准备。带着壮士出征前的豪气，我忙于和各路朋友们道别。妈妈还在牛棚里，很多生活用品的细微准备都有赖于姐姐。待我和朋友们高谈阔论，挥手告别后回到家里，姐姐把我的行李箱准备好了。秋衣秋裤，内衣内裤都放得井井有条。内裤还是她请大串联时同行伙伴的母亲帮忙缝制的。

我想不出草原会有多么落后，想不出游牧生活会有多么艰苦。离家远行，一切要靠自己了。我们小时候有小病一般不去看医生，妈妈会到药店给我们买药治疗。耳闻目染，对常见疾病和药物有所了解。为了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生存，我买了一些常用药、几本农村医疗手册、针灸教材和针灸用品。同行同学林歆的祖母给我介绍了针灸用具、主要穴位和下针手法。大姨家的老邻居王老师在中学教体育，我向他学习了一些病的气功救治手法，包括肠胃病和高血压。

马上要远离父母独立生活了，我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在年初报名去北大荒的时候，我带着手上的冻疮去了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一位老先生给我开了两盒药膏，一盒用于有冻疮裂口的时候，一盒用于伤口愈合后。神奇的是自从我用了药膏，手再也没有生冻疮。

——待续——

(本文收录进“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系列丛书《永远的青春》。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版权归属作者。)